

《資本論》典故注釋選輯

(三)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A-4
000096

編 者 序

柳居士〔三，序10〕 威廉·柳居士(Wilhelm Lexis, 1837—1914年)，德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統計學家。他在波恩大學畢業後，住在巴黎研究法國經濟，1872—1914年曾在好幾所大學任教。他著有《人口統計原理導論》、《普通國民經濟學》等書。

柳居士在研究統計數列的安定性原理時，企圖借數學來宣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永恒性和自然性的謬論，並證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調和”的可能。在資本主義向其壟斷階段過渡時所產生的這種辯護學說，有許多的隨從者。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柳居士主要是研究貨幣流通。他反對貨幣數量論，擁護貨幣金屬論。

在1885—1895年間，柳居士曾多次在《國民經濟統計年報》和《經濟學季刊》中發表文章反對馬克思，無恥地攻擊《資本論》。

耶方斯〔三，序12〕 威廉·斯坦萊·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年)，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邊際效用論的奠基人之一，數理學派的代表。他的重要著作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1871年)。

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一書中，耶方斯提出了庸俗的主觀價值論。按照他的意見，商品的效用不是物品固有的性質，在特有一定量商品的條件下，由於人們對商品的各部分的欲望程度不同，因而它們的效用也不同。他舉例說：“每天給一個人一磅麵包，可以使這個人不致餓死，所以這磅麵包有可以想象的最高的效果。每天再給

他一磅面包，这第二磅面包，也有不小的效用，即不是万不可少的，但可以在比較丰足的状态下維持他的生活。第三磅便成为累贅了。所以，十分明白，效用不与商品为比例：同是面包，但它的效用，随我們已有的数量的多寡而变化。”根据耶方斯的断言，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最后的效用程度（奥地利的庸俗經濟学家称为“边际效用”），而最后的效用程度就是“表示現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耶方斯认为，商品的最后效用程度是随着商品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商品量增加，商品的效用就要减小。例如，人們需要1吨水就完全滿足需要了，如果水增加到2吨，那么水的最后效用程度就会等于零。如果水减少到半吨，那末水的最后效用程度就会提高，而水的价值也提高了。所以，耶方斯說最后效用程度（即商品的价值）依存于一种商品的相对稀少性。

耶方斯的“最后效用論”是錯誤的，因为他不仅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把商品的效用看作是人們主觀心理上的东西。耶方斯捏造出“最后效用論”，无非是想割裂价值与劳动的联系，然后随心所欲地解释利潤的来源，以达到掩盖資本主义剝削的目的。

門格尔〔三，序12〕 卡尔·門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年），奥地利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創始人。

他曾任維也納大学的教授，皇太子經濟学讲师，上院的終身議員。他的重要著作是：〈国民經濟学原理〉（1871年）、〈社会科学和經濟科学的研究方法〉（1883年）、〈德国国民經濟的历史主义的謬誤〉（1884年）。

門格尔是臭名昭彰的限界效用論（或譯为边际效用論）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人們对物品的欲望强度和主觀的評價，來說明物品的价值。按照他的說法，人类的欲望是政治經濟学中最根本的东西，

是价值的基础。他认为，随着消费物品单位数量的增加，人们所受到的物品的效用将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成为零。他得出了所谓效用递减“规律”，并断言消费物品的价值就是决定于物品的限界单位所具有的效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取决于“满足欲望中最不重要的重要度”，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门格尔尚未使用边际效用这个名词，到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维塞尔才开始使用）。

门格尔的“理论”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劳动所创造的，而价值的大小则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与人们对财货的欲望强度和主观评价毫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市场上对于同一商品，无论各个购买者的欲望和主观评价如何千差万别，商品总以同一价格出售，其基础就是价值。因此，门格尔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但尽管如此，门格尔的“理论”仍然为现代资产阶级所继承，用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在英国，人们在耶方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学说与限界效用学说上，建立庸俗的社会主义〔三，序12〕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庸俗社会主义，系指费边社会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而创立的英国反动资产阶级流派。费边社会主义在1884年形成，称为“费边社”，其代表鼓吹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能够逐渐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费边社”这一名称是由善于谨慎缓进的战略取得同敌人妥协的罗马大将费边·孔克达特（“缓进者”）的名字而来的，所以“费边社”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证明费边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了。

1889年“费边社”发表了一本由萧伯纳（费边社创始人之一）

主編的論文集《費邊論叢》，在這本文集中，費邊社分子闡述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綱領。費邊社會主義的代表們激烈反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把他們的“社會主義”建立在耶方斯和門格爾的最後效用或邊際效用“理論”的基礎上。按照蕭伯納的意見，“邊際效用論”可以用來為勞動者謀福利。他武斷地說，借助“邊際效用論”，便可以證明國民收入平均分配的必然性。他認為，對於富人來說，許多貨幣並沒有發揮很大的效用，而對於窮人來說，每一個英鎊都保證着高度的需要。由這一點出發，他硬說，如果實行若干的再分配，那末，貨幣總額雖然不變，但效用總額則會增加，因為窮人拿到貨幣，就能夠提出對商品的很大的需要。費邊社分子認為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由於私有制的存在所引起的，因而他們主張實行工業資本和土地的社会所有。但是費邊社分子所說的生产資料社会化归根結底只不過是一種騙人的把戲，因他們認為實行生产資料的社会化毋須打碎旧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国家机器。按照費邊社分子的荒謬說法，英國現在已具有一個由教區議會直到中央政府為止的完全民主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可以用來進行各種社會主義的措施。費邊社分子反對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來推翻資產階級專政，而竭力宣傳只要努力用自己的理論來影響人民生活，用實際措施來加強国家(資產階級国家)的力量，就能實現社會主義。十分明顯，這種社會主義是極端反動和庸俗的。

恩格斯在1892年9月4日給考茨基的信中，把費邊社分子評定為一批力圖使工人跟着自由派走的典型的資產階級政客。恩格斯寫道：“這是一幫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從利欲熏心的鑽營之徒直到善感的社會主義者和慈善家，他們只因為懼於工人統治的威脅而聯合起來，並且為了預防這種危險，決心什么都干。”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莫斯科英文版，第530頁)稍後，恩

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給左尔格的信中，称倫敦的費边社分子为一伙钻营之徒，“害怕革命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同上书，第537頁）

蕭伯納〔三，序12〕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英国的剧作家、小說家和政論家。在1884—1900年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問題的文章和小冊子，其中包括費边社的論文集。他是一个庸俗和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主张資本主义能够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发表了許多小說和剧本，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資本主义。所以恩格斯对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曾作过如下的評述：“蕭作为一个小說家是很有才能和机智的，可是作为經濟学家与政治家却断然一文不值。”（《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莫斯科英文版，第529頁）。不过，恩格斯认为他与大多数費边主义者不同，他并非野心家。

19世紀90年代末，蕭伯納成了一个著名的戏剧家。此后他繼續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时，他表示同情，并曾在1931年訪問苏联，回国后发表了許多文章和談話，称赞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他对記者說，斯大林是最能干的政治家，英国应采取苏維埃制度。在20世紀30至40年代，蕭伯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进行过批評。他反对侵略战争，一貫支持苏联。但是必須指出，蕭伯納的經濟观点和政治主张始終沒有根本的改变，他始終是一个资产階級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希密德博士〔三，序13〕 **康拉德·希密德**（Conrad Schmidt, 1865—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經濟学家和哲学家，他在中学畢業后，在高尼科斯堡和柏林學習过哲学和政治經濟学，并于1887年获得政治經濟学博士称号。在80年代他研究过馬克思的

《資本論》，並曾與恩格斯通過信。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編者序中所指出，希密德還在《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以前，已接近於獨自解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詳細分析的某些問題，如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和商業利潤的源泉等等。但是希密德不能解決價值與生產價格的關係問題。

希密德在研究抽象的經濟理論問題時盡量避免政治問題，因此恩格斯在給希密德的信中，批評了他在政治上的消極性。後來希密德從馬克思主義滾到了修正主義的泥坑。他的論文《對馬克思價值規律的正面批評》，表明了希密德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辯護人。

在哲學方面，希密德是一個新康德主義者。他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和康德哲學在康德認識論的基礎上“結合”起來。普列哈諾夫在他於1898—1899年所寫的《希密德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書中，曾對希密德的观点給予了唯物主義的批判。

《新時代》〔三，序15〕 《新時代》（Die Neue Zeit），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它從1883到1917年由卡爾·考茨基主編。馬克思的偉大著作《哥達綱領批判》就是恩格斯在1891年不顧考茨基的反對，第一次在《新時代》上發表的。恩格斯的名著《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早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新時代》，但因考茨基的阻撓，直到十年以後才發表出來。

費爾曼〔三，序15〕 彼得·費爾曼（Peter Fireman, 1863年生），美國的化學家。他出生俄國的基輔，十九歲大學畢業後去美國。1890年從美國到歐洲，在德國、瑞士和烏克蘭等地學習物理化學。在歐洲時，他結識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希密德，據說他還在倫敦拜訪過恩格斯。1893年他回到美國，在華盛頓當過化學教授，

担任过福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化学研究所主任，作过磁性染料公司經理和哥倫比亞炭素公司董事，并曾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會員和化学家协会會員。此外，他对哲学和經济学也有研究，曾是美国哲学学会會員，出版过《健康的思維和感觉力的認識論》等著作。在欧洲求學期間，还和希密德討論过“平均利潤率”問題。

他在說明平均利潤率的时候，已經发现竞争使利潤趋于平均化的問題，同时他还看到在平均利潤条件下，社会商品的总价格是和价值一致的。但因为他在分析平均利潤形成的时候，缺少很多必要的中間环节，所以他并没有完全明白地解决平均利潤的問題。他的見解也沒有被人所重視。

舒里克的沃尔夫教授〔三，序17—18〕 朱里亚·沃尔夫 (Julius Wolf, 生于1862年)，德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舒里克大学教授。他著有《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社会組織》(1892年)、《严密科学的經济学》(1908年)、《現在和将来的国民經济》(1912年)，等等。

沃尔夫是資本主义制度最热心的辯護士。他不仅攻击馬克思主义，甚至还反对一切改良主义的主张，例如他反对讲坛社会主义的主张。沃尔夫在《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社会組織》中，攻击馬克思的无产階級貧困化学說。他认为无产階級、特别是小資产階級的物质状况是在不断改善的，这种改善是資本主义发展必然的結果，而不是改良的結果。按照他的意見，无产階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的发展程度，不是取决于分配关系。沃尔夫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宣揚資本主义社会“階級利益調和論”，工人应当积极为資本家生产，因为生产的增长同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洛里亚〔三，序19〕 阿契尔·洛里亚 (Achille Loria, 1857

—1943年)，意大利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曾任托里諾大學經濟學教授，在墨索里尼執政時，他是法西斯的科學院的院士。他著有《地租和自然的分配》(1879年)、《財產和社會制度》(1892年)等書。

在科學上，洛里亞是一個騙子和抄襲者。他曾可笑地吹噓唯物史觀是由他發現的。當他的騙局被揭穿時，他就惡意攻擊，說馬克思不是這個理論的創始人。他說如果亞里斯多德對這個理論沒有說過什麼，哈林格吞無論如何已在1656年毫無疑問地把它宣布了。

洛里亞瘋狂地反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他斷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主張商品依照價值來售賣，而在第二卷又主張商品從來不依照價值來售賣。他硬說這是“理論上的破產”、“科學上的自殺”。其實，這只表示他對價值與生產價格的毫無所知。洛里亞激烈反對馬克思關於商品的總價值與總價格相一致的观点。他說：

“價值即不外是一個商品對另一個商品的交換的比例，所以總價值這個觀念已經是不合理的，是胡說。”這正好說明他對價值的說明是何等的謬誤。在他看來，價值與價格是同一的東西。一種商品有多少種價格，也就有多少種價值。

洛里亞先生偷來的孔雀羽毛〔三，序20〕 這是恩格斯對洛里亞的一個諷刺比喻，出自《伊索寓言》。

據傳說，宙斯（即神王）想把鳥類中間最美麗的一個立為它們的王。於是都到一條河裡去洗身體。有一隻烏鴉看到自己渾身丑陋，便去拾起那些鳥類落下的羽毛，插在自己的身上。於是它在他們中間顯得最美麗了。到了約定的日期，一切鳥類都走到宙斯面前。烏鴉變得花枝招展地也去了。宙斯看它美麗，想立它為王。鳥類都很生氣，各自把自己的羽毛從烏鴉身上拔掉。這樣，烏鴉又恢復了原來的丑態。

恩格斯在這裡把洛里亞比作《伊索寓言》中的烏鴉。洛里亞用

剽窃别人的东西来打扮自己，借以炫耀。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有朝一日洛里亚身上偷来的美丽的羽毛，也一定会被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所拔掉。

加利波底〔三，序24〕 居塞伯·加利波底 (Gui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年)，意大利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意大利解放战争 (1848—1849、1859年) 中的解放军的领袖。

19世纪初的意大利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国家，它受到奥地利的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和压迫，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意大利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为了消灭封建制生产关系，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加利波底就是当时革命运动中的杰出英雄。他还在二十四岁时，就参加了当时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党”，并接受了该党领袖马志尼的建议，在1833年到撒丁王国海军中去做革命工作，准备武装起义。1834年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加里波底逃到了南美洲，在那里他参加过里约格兰得省的独立斗争和蒙得维多（即现在的乌拉圭）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当意大利革命重新开始时，他赶回意大利。由他组织和率领的“红衫军”曾屡建功勋，数次打败了奥地利的侵略军，并在1860年跨海远征，去援助西西里的农民起义，解放了西西里全岛。

加里波底被恩格斯称为“大无畏的领袖和巧妙的战略家”，“有科学素养的将军”。

斯加纳勒尔〔三，序24〕 斯加纳勒尔（《资本论》第三卷第1168页中译为西加纳累尔，Sganarell），是16、17世纪法国集市戏院所形成的一个滑稽人物，它在法国喜剧中是一个反映第三等

級可笑的、低級趣味的角色。

斯加納勒尔这个名字，来源于意大利假面戏中的人物——沙納勒尔。沙納勒尔代表着两种不同性格的仆人，一种是机灵、狡猾、坚强的城市人，一种保持着农村的朴实性。在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剧本中，克服了意大利喜剧中的公式化，斯加納勒尔以资本家、农民、仆人等不同的姿态出现。他们在性格上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作为农民的斯加納勒尔（有时以滑稽的、传统的英雄出现）和作为资产者的斯加納勒尔，更有其不同的性格。但是一般说来，斯加納勒尔是一个愚蠢、无能和卑鄙的代表，是庸俗和低級趣味的典型，是滑稽可笑的反面人物。例如，在《斯加納勒尔》一剧中，斯加納勒尔是妒忌者的形象，自以为是带绿帽子的丈夫，并企图杀死想象中的奸夫。但是他又怕被奸夫所杀死。在“丈夫学堂”（1616年）中，斯加納勒尔是一个落后的、中世纪世界观的代表者。他憎恨一切新鲜事物，坚决拥护建立在严厉、暴力、强制和独揽大权基础上的家庭。莫里埃用斯加納勒尔这个形象，鞭撻了旧社会和不合理的买卖婚姻，鞭撻了贵族和资产者。

恩格斯在这里用斯加納勒尔这个形象，来讽刺洛里亚。洛里亚象斯加納勒尔一样，具有庸俗、卑鄙、愚蠢和低級趣味的品质。

杜尔加馬拉〔三，序24〕 杜尔加馬拉 (Dulcamara)，是意大利音乐家和作家加伊泰諾·多尼則蒂 (Gaetano Donizetti, 1797—1848年) 的歌剧《爱神厄利济尔》中的一个人物，他同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剧本《斯加納勒尔》中的斯加納勒尔一样，是一个爱说大话的骗子手。

恩格斯用杜尔加馬拉这个形象来讽刺比喻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里亚，因为洛里亚无耻地攻击马克思，并吹嘘说自己最早发现了唯物史观。

第一篇 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餘價值 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一章 成本價格與利潤

當時也很有名的燃素負重量〔三，21〕 “燃素”說是關於物質燃燒原因的學說，它在18世紀化學中占着優勢。燃素被認為是存在於一切可燃物質成分中的元素，燃燒過程就是物體分解成為飛散的燃素和殘余的灰分及渣滓的過程。這個理論的支持者說，在物體中燃素愈多，它就愈易着火和燃燒。

當時的化學家們認為燃素的重量是負值，它在燃燒時就從物質中逸出。18世紀末，隨着氧的發現，“燃素”說的這種假設才被徹底推翻。

馬克思在這裡用燃素的負重量來比喻馬爾薩斯對商品在價值以上售賣這件事情所作的解釋。燃素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關於它的重量是負值的說法也是完全荒謬的。馬爾薩斯的解釋，也象“燃素”說一樣荒謬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巴爾扎克的最后一篇小說《農民》〔三，21〕 巴爾扎克是19世紀法國的現實主義作家。《人間喜劇》是他的一首雄偉的史詩，其中描寫了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一個完整的時期；同時也是一部控訴書，向全世界控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人間喜劇》共包括九十六部長短篇小說，其中《農民》是巴爾扎克在1838—1847年間寫成的一部長篇小說。巴爾扎克以其巨大的真實力量創造了一批令人感到可驚的形象：這是一群一心積攢錢財的吸血鬼、轉租土

地生利的大商人、絞尽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方肯歇手的高利貸者的形象。巴尔扎克指出，法兰西的这批新主子的一切活动，同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他們钻进了国家政权机关，他們把各式各样的债务和义务象蜘蛛网一样地纏到农民头上，使农民日益陷于破产境地。至于国家政权，只是他們利用来达到其貪婪的自私自利目的的工具。在《农民》一书中，巴尔扎克也描写了正面形象，如老年的共和主义者尼茲龙，他“純潔得象黄金，坚强得象鋼鉄”。但他們沒有成为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主要的主人公，这些形象还处在次要地位，並沒有得到闡释和扩展。

第三章 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里嘉图：“利潤恰好与工資的低或高相比比例而成为高或低”

〔三，55〕 里嘉图是英国資產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論，得出了关于利潤和工資相互对立的学說。按照里嘉图的意見，商品是按劳动時間所决定的价值出售，而从这一价值中扣除了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工資以后，剩下來的部分就是利潤。

里嘉图把利潤看作商品价值减去工資的余額，于是便得出了如下的重要結論：利潤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工資的变化，工資的变化是原因，而利潤的变化則是結果。两者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即工資降低則利潤提高，工資提高則利潤降低。利潤的形成和变化的最后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然而劳动生产率并不直接影响利潤，而是通过工資的变化来影响的：生产率提高便降低生活資料的价值，这时工資开支便减少，因而利潤便提高；相反地，劳动生产率降低便提高生活資料的价值，这时工資开支便增加，以致利潤减低。如果劳动

生产率低到使工资占据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那末利润也就不会存在了。

里嘉图的关于工资和利润相互对立的学说，实际上揭示出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但是，在里嘉图的这个学说中也包含严重的缺点：(1) 他把工资和利润的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的”和永恒的规律。(2) 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混为一谈。(3) 他只看到相对剩余价值，而没有看到绝对剩余价值。其实，劳动生产率高低并不是剩余价值率变化的唯一原因，劳动日的长短和劳动强度的大小也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指出：里嘉图的关于工资和利润相互对立的说法，只有在“资本的百分数构成不变、劳动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的场合下，才是正确的。

第四章 资本周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

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地把东亚及澳洲包括在汽船交通之内〔三，63〕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苏伊士地峡，因为它位于红海与地中海的连接地带，所以它的开掘对于大西洋与印度洋甚至太平洋的海上运输极关重要。

苏伊士运河是在1859年动工开掘的，直到1867年才完成。运河的开掘权开始时是由法国的资本家们得到的，运河通航了以后，英国资本家利用埃及财政困难，趁势把自己的势力侵入，因而实权落到了英、法两国资本家的手里。

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它发生了以下几项重要的影响：第一，缩短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航程，以前绕好望角到新加坡约为21,680公里，现在只有14,930公里，缩短了航程约33.5%；第二，对地中

海沿岸許多商港，如馬賽、熱那亞、的里雅斯德和亞里山大里亞等有重要影響，使它們變成世界交通綫的重要水道；第三，由於這一海上捷徑的完成，使得歐洲帝國主義的勢力更容易侵入遠東；第四，支配運河的帝國主義平時可以控制航路的運輸，戰時可以控制這一重要戰略意義的津渡。因1956年埃及收回了運河的主權，對帝國主義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第四章是恩格斯補寫的）在這裡非常注意蘇伊士運河的開掘，指出它對於縮短流通時間上的重要意義。蘇伊士把歐洲、東亞及澳洲用汽船這樣新的交通工具聯繫起來了。

第五章 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經濟

勞動者自己所有的工廠——羅虛德爾工廠〔三，82〕 這是指英國羅虛德爾市工人，在19世紀40年代末開始建立的工廠。

最初工人們在1842年創立了“比古坡和維洛德爾新營業公司”，該公司建立的第一個工廠是“克拉米·卡烏茲”，建立時的資金僅為20,000英鎊，但很快就達到30,000英鎊。以後又建立了“伐爾哥里木”工廠，該工廠規模較大，機器動力達到100匹馬力。該公司成立以後，營業情況一般很好，工廠規模不斷擴大，到1854年已能支付40%的股息，資金增加為60,000英鎊，並擴大了“伐爾哥里木”工廠，增加了兩架40匹馬力的機器。由於該公司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使羅虛德爾市開始出現了更多的為勞動者自己所有的工廠。例如：“羅虛德爾工業協會”，它包括有“烏艾爾”和“義爾維利·米里”兩個工廠；“新齊爾齊紡織公司”，它包括有“維爾米利”和“維克托利克”兩個工廠，擁有機器動力100匹馬力，工人達450人，此

外，还有“罗維尔斯托里紡織棉布公司”（它拥有“盖尔卡里木”工厂）以及“克拉夫棉布公司”（它拥有“义尔維利·斯希里格斯”工厂）。

这些工厂是由当地劳动者自己建立起来的，90%以上的股东均为工人，他們也在这些工厂内劳动并領取工資。这些工厂，由工人们自己选择出管理委员会負責管理。由于工厂的生产資料和财产为工人所有，因此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較高，并且能經常注意保护工厂的机器和财产，节省生产資料和原料的使用，使得工厂的生产能有較好的发展。

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工厂，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引起了当时人們的注意，但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它們的存在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資本家的竞争和資本主义市場的影响下，它們不是紛紛破产，就是为資本家所滲入，蜕化为資本主义的工厂。

費尔貝倫〔三，88〕 彼得·費尔貝倫（馬克思在这里引用为托馬斯·費尔貝倫）(Petes Falsbaisn, 1799—1861年)，英国的資本家、工程师。他在早年当过学徒和棉花机械师，曾从事改良紡織机的工作，以后創辦了机器制造企业。費尔貝倫在机器制造方面有許多发明，例如他建議用8个錠子来代替10个錠子，改良了紡綫机器，建造了一些毛織和紡絲的机器和割搓、拉钻孔、刨平鋼的大机器等。在政治活动方面，費尔貝倫当过市議會議員和市长。

伪君子柏登〔三，88〕 約翰·威尔逊—柏登 (Gohnwilson. Patten, 1802—1892年)，英国托利党党员，保守的政治活动家。他在1830年作为兰开夏选区的代表进入議會。1842—1872年他是英国陆軍上校，1868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管理爱尔兰事务方面的秘书，

1874年被封为爵士并进入貴族院。

柏登是非常保守的人物，并善于使用两面派的手法。1833年他反对限制女工童工劳动時間的法案，但是在表面上却主张要組織一个皇家委员会去全面調查这个問題。所以馬克思称他为伪君子。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在原料价格对利潤率的影响問題上，托倫斯在理論上完全錯誤地解释这件事〔三，109〕 罗伯特·托倫斯是英国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

托倫斯发现了里嘉图理論体系中价值規律与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規律之間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剩余价值之轉化为利潤、利潤之轉化为平均利潤的过程，而把事物的表面現象当作事物的本質，所以他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論断，即认为只有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下价值才取决于劳动時間。他写道：“在社会发展的初期，社会尚未分裂成为一个資本家階級和一个劳动者階級，从事一个职业的个人，都亲自实行劳动。在这个时期，就是由生产上支出的劳动总量（蓄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作为比較和竞争的基础，并在交易或买卖上，最后决定一种商品在交换別种商品的一定量时，应給予怎样的分量。但自有資本蓄积并有一个資本家階級和劳动者階級相区别以来，自有一种人，当作企业家，在一个产业部門出現而不亲自劳动，但墊支生活資料与原料于他人以来，决定商品的交换力的，已經是生产上用掉的資本量或蓄积劳动的量。”

这样一来，在資本出現以前，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而在資本出現以后，价值則决定于資本量。但是，价值又为什么是决定于資本量呢？托倫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两个資本相等的限度內，常常